

「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 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徐火炎**

《本文摘要》

本文首先從引介心理分析的「情結」概念開始，然後配合歷史背景與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後的政黨消長、統獨議題與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論爭等，進一步說明當前流行所謂「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現象。其次，本文從選舉調查的經驗資料，將「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加以操作化測量，從而觀察分析選民對李登輝作為台灣人第一位總統所刺激引導的「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究竟受到什麼因素影響，又是否決定他們的黨派投票抉擇。本文資料分析的結果發現，選民對李登輝懷抱不同的一種情結心理，主要是因為省籍、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傾向等因素的差異所致。此外，雖然在台灣省長與台北市長選舉時，候選人的選舉訴求都環繞在「批李、反李登輝」與「擁李、追隨李登輝」上，但資料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假定一併考慮選民的政黨認同傾向、對候選人與政黨的評估時，選民的「李登輝情結」對他們的黨派選舉抉擇，只具有「不太顯著的」直接影響效果而已。本文的分析最後指出，選民的「李登輝情結」心理，確實是構成選民評估候選人與政黨的主要影響因素，

* 本文曾於台灣政治學會第二屆年會學術研討會中宣讀，台灣大學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1995年12月23至24日。研討會中承蒙論文評論人陳義彥教授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刊登之前亦受惠於兩位匿名論文審查人的批評與修正意見。本文分析的兩筆資料，分別是本人主持關於省長選舉的國科會計畫（編號：NSC-2414-H-001-003-Q3）與台灣大學朱雲漢教授主持關於台北市長選舉國科會計畫（編號：NSC-24114-H-002-027）等所收集的選舉調查資料。作者特別向參與這兩項計畫的共同研究設計同仁及進行面訪的資料收集工作同仁等，致上最大的謝意。資料的分析與解釋，以及文字不妥或錯誤等，責任都在於作者本人。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進而對選民最後的黨派投票抉擇，具有重要而顯著的間接影響效果。

關鍵詞：情結、李登輝情結、台灣結、中國結、思維結構體、政黨（國民黨、新黨與民進黨）認同傾向

壹、前言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逝世，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宣誓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開始，台灣的政局可以說走進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首先是台海關係的丕變：隨著戒嚴令的解除，政府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從此統治中國大陸的「偽匪政權」改稱為「中共當局」，而台灣與大陸的兩岸關係也由冷戰的敵對狀態，進入一個所謂「經濟合作、政治對抗」與「三通不通、此外都通」的新模糊階段。其次是國內政治權力舞台的轉變：一九九一年底第二屆修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後，所謂「終身職」的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也在一九九一年底全面退職，而自第二屆立法委員在一九九二年底選出後，不僅「萬年國會」一詞從此成為台灣政治的歷史名詞，同時，一個具有較廣大民意基礎的國會終於開始運作；此後，政治權力的基礎則「由上而下」開始改變為「由下而上」的方向發展。第三是政黨政治的出現與國民黨的分裂：解嚴後的黨禁開放與一九八九年元月完成立法的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終於讓青年黨與民社黨以外的在野政治勢力，可依法組織政黨，不必再遭受當權者政治上的打壓；一方面是在野政黨的急劇增加，從民進黨出現以來，解嚴後的台灣政黨數目在一九九三年為止，竟高達七十多個；另方面則是國民黨的分裂，除了黨內有主流與非主流的兩大陣營之分外，而自稱國父最忠貞信徒的部份國民黨員，則另起爐灶組成與國民黨對抗的「新黨」。

除了全球性的民主化潮流外，上述這些國內外環境的重大變化，都牽引著台灣近年來政治動脈的跳動起伏。在這一個嶄新的時代之中，緬懷昨日的政客或習於過往的民眾，也許不能一下適應這樣的新情勢，然而，這種鉅變卻是戒嚴三十多年來所累積的與延遲的必然結果。隨著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世界潮流，台灣也勢必不能在這民主時代的大環境中缺席而孤立出去；所以，不論生活在昨日的政客或為今天溫飽而奔波的民眾，都必須在這新時代的轉變過程中，尋求政治自我的定位。事實上，近年來局勢的發展與演變都在於顯示：絕大多數的政客與民眾，在台灣政治民主化與找尋國家主權的過程中，一方面積極地學習如何適應一個比較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另方面也

加入統獨的爭論並採取立場，更用選票與行動去左右台灣政黨勢力版圖的重劃工作。

本文的分析即在於嘗試了解：選民在台灣逐漸走向民主化、競爭性政黨政治出現與國家認同分歧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對主導台灣政治的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會具有怎樣的政治心理取向；這樣的政治心理取向與選民的投票行為又具有怎樣的關係。在中智階層之間與新聞媒體上，「李登輝情結」可說是政治討論與對話中的流行語彙。本文應用政治心理的概念與選舉投票的理論模型，一方面嘗試將「李登輝情結」的現象加以概念化與測量，另方面藉此分析一般選民大眾這種政治心理現象與黨派投票行為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嘗試無非是基於學術研究的旨趣，希望藉由這選民大眾政治現象的分析，除了有助於了解李登輝時代中台灣選民的政治心理之外，同時對台灣的政治心理與投票行為研究，無論是作為參考或借鏡，或許也能提供知識累積的積極作用。

貳、「情結」的概念與「李登輝情結」的現象

「情結」一詞是當前新聞媒體與一般大眾所慣用的日常語言，但作為學術研究上的概念，卻可追溯到心理分析的理論。最早引介與應用這個概念的Carl G. Jung [1875-1961] (1960a, 1960b) 將「情結」(complex) 視為是存在於個人潛意識中的一種有組織而且相互關聯的情感、想法與記憶或印象而言。他認為這種相互關聯的心理現象，乃是環繞著一種創傷性事件之特定印象與記憶而形成的，而且這種相關聯的心理現象不同於一般意識面所謂的「態度」；由於情結所指的主要是潛意識的心理現象，因此，當情結的心理發生影響作用時，與正常有意識情形下所顯現的心理特徵也會有所不相容。Jung列舉一些特殊潛意識的心理現象，如「母親情結」、「亂倫情結」、「閹割情結」、「權力情結」、「救世情結」等等，這些特殊的心理現象都是因創傷性事件或道德衝突而引發形成的一組夾雜感情、想法與記憶的意念組合。後來，佛洛依德 (S.Freud) 認識Jung後也將「情結」的概念應用於他提出而為一般人所熟悉的「戀母情結」之潛意識現象；Alfred Adler則進一步跳開心理分析的理論途徑，而將這概念應用於社會心理學上他所謂的「自卑情結」，並認為這是一種帶有侵略性、權力慾望與追求優越性以獲得補償作用的心理現象。

「情結」的概念主要是源自於探討精神心理疾病個案的心理分析，後來研究社會互動心理現象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雖然逐漸揚棄「情結」的概念，但「情結」一詞卻日漸流行。在當前台灣的政治討論與對話中，似乎把糾葛不清的感情傾向都稱之為「情結」，例如：「台灣結」與「中國結」所隱含的「情結」概念，以及本文所要探討的「李登輝情結」等。假定我們沒有誤解Jung對「情結」的用法，則「情結」可說是專指個人在兒

童早期階段因為創傷性的事件影響而形成的特殊潛意識心理現象。這種心理創傷而產生潛意識心理的「情結」用法，並非我們目前所了解的「李登輝情結」心理現象的內涵。在缺乏證據說明個人生命歷程中曾經發生創傷性事件，以至於形成以「李登輝」為對象的特定感情、想法與記憶交雜的強烈意念時，用心理分析理論上的「情結」概念來說明「李登輝情結」的心理現象並不恰當。因此，要理解所謂「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現象，我們必須從「台灣結」與「中國結」著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情結」含意，就比較接近是一種「潛意識」的心理現象。要了解這種潛意識內涵的「台灣結」或「中國結」，我們必須再介紹Jung晚年比較強調的所謂「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Jung（1969b）將超越個人而集體存在的一種「情結」稱之為「集體潛意識」，這種潛意識不再強調個人早年的創傷性印象，而是指一種從先人過去生活演化經驗（包括文化與種族等）所遺留下來的潛在記憶庫；同時，他認為對一般具有共同經過生活演進歷程的人群而言，這種潛在記憶庫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因此，對一個群體而言，在情緒內涵上共通存在的一組相互關聯的想法與記憶之形式（即所謂「集體潛意識」），Jung則稱為一種「原型」（*archetypes*）。「台灣結」或「中國結」的意義，就是比較接近這兩種存在於個人內心深處之「集體潛意識」，在記憶庫中分別強調「台灣」與「中國」為共同生活演化經驗範疇的「原型」。

從上面介紹Jung早期所使用「情結」一詞到晚年應用「集體潛意識」概念的發展來看，這兩個概念所指涉的同樣都是潛意識的心理現象，而主要的差異不外在於：「情結」概念所強調的是「個體層次上」因創傷事件所引起的潛意識，而「集體潛意識」概念所指的是同一群體所共通的、因先人共同生活史所形成與遺傳下來的一種「集體層次上」的潛意識。假定我們對Jung的心理分析理論沒有誤解的話，則可以從他認為這兩種潛意識都是構成一個人的重要心理動力之基礎上，來說明一個人的「情結」或「集體潛意識」的作用，就如同其他心理學理論中所謂的「人格」之影響一樣，會在無形中組織一個人生活中的種種經驗，進而影響到個人意識面的價值、態度與意見。當然，我們不是從事心理分析的工作，而是在於應用社會調查資料分析政治心理與行為，雖然我們借用當前流行的「情結」一詞，進而溯源於Jung在心理分析對「情結」概念的用法，但我們以下所謂「李登輝情結」的測量，只能從一般選民對李登輝總統的心理取向或所謂「態度」與「意見」著手，間接地去了解表現在一般選民心理取向上的一種「李登輝情結」。

這種以分析社會調查資料來說明心理分析理論上「情結」概念所隱含的一種潛意識心理現象，一方面可說是學術研究上大膽的嘗試，另方面這種資料的分析也必然具有很大的侷限性。學術研究上的大膽嘗試，必須透過小心的驗證才會是有意義的新嘗試，因此，本文大膽嘗試的一個目的，無非是想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希冀以後會有更多小心

驗證性的研究出來，以達到知識累積的積極效果。在正確的學術研究上，任何資料的使用都存在一定的限制，所以本文應用社會調查資料來了解一般人內在深層心理現象的侷限性，只能透過相關的理論與配合歷史經驗脈絡來彌補。尤其，我們以分析調查資料來說明這種心理分析理論所指的「情結」潛意識心理，更需依賴這種心理現象發生的背景脈絡來輔助了解。以下，我們先說明應用社會調查資料可以間接分析「情結」心理現象的相關根據，接著再交代「李登輝情結」所以形成與存在的歷史經驗背景脈絡；這樣的處理方式，希望可以將侷限性減至較小的程度。

首先，就目前社會認知理論而言，一個人的腦海中都存在一種所謂「思維結構體」(schema or schemata)，這種由先前存在的知識而形成的認知結構，決定一個人對相關新訊息刺激的吸收、記憶與推論。(Fiske and Taylor, 1984) 假定一個人具有以某種對象為主的「思維結構體」¹，則一旦個人碰到某種對象為主的任何訊息刺激時，這種先前知識與記憶中的認知結構（即思維結構體）往往會從「腦海中立即浮現」(off the top of the head)，以吸收處理這種刺激然後加以回應。(Taylor and Fiske, 1978) 因此，應用社會調查資料來研究民意理論與政治心理學的John R. Zaller (1992) 就認為：重點不應在於假定一般民眾的心中是否對某種態度對象有「真的態度」存在，而主要問題就是要了解一般受訪民眾對被詢問到的對象，到底具有怎樣程度的「認知」；以受訪者熟悉的或有充分認知的對象來設計測量問題，就可以比較精確地了解到受訪民眾在回答這些測量問題時，「腦海中立即浮現」的考慮與決定所表現的心理現象究竟為何。我們以社會調查的資料來觀察「李登輝情結」的心理現象，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本前提上。一方面我們認為：一般受訪民眾對於（一）李登輝是總統、（二）李登輝總統是台灣人與（三）蔣經國指定李登輝為繼承人等問題，不知道或沒聽過的比率應該非常少，因此，他們所以不回答這些測量問題，是有其他的考慮與決定，並非出於他們缺乏足夠的認知；另方面我們認為從受訪者對這些熟悉對象為測量問題的回答中，可以比較精確地了解到受訪民眾對「李登輝總統」為刺激訊息時，他們「腦海中立即浮現」的心理取向究竟為何。

其次，我們必須從歷史經驗的脈絡中去解構民眾對李登輝總統所懷抱的一種「情結」之心理現象。當然，本文的分析重點在於資料的分析，對於「李登輝情結」形成的歷史經驗脈絡，僅止於說明我們測量題目設計上的考慮與研究發現的解釋而已。在前言中提到台灣解嚴後的時代，乃是李登輝主導的一個新面貌政局的發展時代，同時我們也指出在這樣的時代中，無論就影響解嚴前後或未來台灣的政治變遷而言，主要是受到台灣與大陸兩岸關係、國內政治正當權力來源由下而上、以及政黨競爭與國民黨的分裂等發展的三種主要變化所牽動。假定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社會與大陸分離三、四十年的歷史發展

事實，則這兩種不同政經體制社會中分別各自具有共通的生活演進史，已經在人民的心靈深處形成與根植了兩種Jung所說「集體潛意識」形成的素材。接著，讓我們從上述這三種變遷的主軸，來看「李登輝情結」心理現象所以形成的歷史經驗脈絡。

第一，就以台灣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的改變而言，結果一方面是擴大與深化了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兩個政治經濟體制截然不同儒家社會的接觸面，另方面也在台灣兩千萬居民的腦海中，對台灣前途的思考上形成「統一」與「獨立」兩個極端的「思維結構體」。具有四十年共同生活演進歷史的台灣居民為何會有「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兩種極端的「思維結構體」？這主要的原因或許就如同Jung在說明「集體潛意識」內涵時所強調的，源於先人過去經驗所遺留下來的潛在記憶庫之差別。因此，強調「中國統一」的人在潛意識的記憶庫，存在著比較多關於與「中國」相關聯的感情、想法與印象，而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則相對地在内心深處的潛意識記憶庫中，擁有比較多關於「台灣」生活經驗的感情、想法與印象。李登輝所主導的時代，不僅碰上這種「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集體潛意識被喚起的時代環境，同時民眾這種統獨的「集體潛意識」被喚起後，卻在解嚴後比較民主開放的政治環境中，可以有較多自由表達的空間得以釋放，進而支配了個人意識面的價值、態度與意見、以至於外顯的政治行為。

李登輝從國民黨代理主席開始，經過一九八九年訪問新加坡時對「台灣來的總統」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而演變至國民黨內部政爭時的「台獨」疑慮，至國民黨一九九〇年「臨全會」與三月總統選舉期間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政爭，以迄於第二屆立法委員選出後由連戰組閣前後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衝突的加劇，最後止於一九九三年部分所謂忠貞的國民黨員自組「新黨」。這一連串對國民黨員具有創傷性事件的影響，例如：李登輝的務實外交以及和日本記者「司馬遼太郎」坦白談話的內容，甚至於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問Cornell大學的舉動與演說等等，在「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兩個極端「集體潛意識」強烈的民眾群體中，都會喚起不同的情感、印象與記憶的意識面反應。換句話說，對所謂具有「中國結」的民眾而言，如國民黨的「非主流派」或「新黨」的支持者等，這些事件與訊息刺激就形成對李登輝「名為統一、實為台獨」的「獨台」、以及李登輝所主導的國民黨是「兩歲的台灣國民黨」等等強烈的感情、想法與印象，這也就是所謂「反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現象；然而，對具有強烈「台灣結」集體潛意識的民眾來說，上述事件與訊息的刺激，則較可能引導他們對李登輝總統種種作為加以「合理化」辯護的一種情感、想法與印象的意念組合，這也就是所謂「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現象。

第二，就國內政治權力正當性逐漸轉變為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轉型而言，李登輝總統主導的時代，剛好就是台灣有史以來開始見到政治民主化進展的時代。這樣的政治變遷

過程，讓李登輝以不同於蔣經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厚植權力基礎以爭取民間支持的方式走進台灣社會。作為當時行政院長時期的蔣經國，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格局下，以開明專制所隱含「家長式的」（paternalistic）方式去親民或探求民瘼；然而，在解嚴後的民主改革聲浪中，曾經當過台北市長與省主席的李登輝，可以很自然地用順應民意的方式走入社會基層，或下鄉為某些支持他理念的國民黨候選人競選，而不會被冠上「虛假做作、另有他圖」的後顧之憂，尤其是以帶有鄉音的流利台語在「千島湖船難事件」後以「土匪」譴責中共的處理等等，這些行為作風不但呼應而且也打動具有強烈「台灣結」民眾的心理。解嚴後政治權力正當性由下而上的民主轉型環境，加上李登輝是第一個台灣人身分的平民總統等因素，就台灣民眾而言李登輝是跟他們站在一起的，在他們心中自然也形成一種「李登輝總統不是外人」的「我群意識」與「認同感」。在這樣的前提下，具有「台灣結」的較強烈民眾，對李登輝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角色，不僅比較相信與接受李登輝自許的「帶領台灣走進國際社會」的一切所為，同時也比較無條件地認為台灣的前途繫於李登輝繼續當總統領導他們。民眾對李登輝的強烈認同與期待，以及對李登輝總統的任何作為都能接受等心理取向，也是我們測量「李登輝情結」的一種指標。比較來看，「中國結」集體潛意識較濃厚的民眾對李登輝走進台灣社會基層與認同台灣民眾的種種作為，以及國家元首角色的扮演等，則比較傾向於認為：李登輝訴諸台灣民眾的支持與民意，其實是將台灣的前途帶進一條「明統暗獨」的險路。「中國結」較強烈的民眾對李登輝提倡「重返聯合國」與「元首外交」等國家領導人的角色扮演作為，持著一種負面的感情、想法與印象等，這種乃是由「中國結」集體潛意識所投射出來的「反李登輝情結」之政治心理。

第三，從政黨競爭的出現與國民黨分裂的變化來看，李登輝固然是民進黨在爭取執政上的最主要對手，但比較複雜的互動關係則在於：以台灣獨立為訴求、以台灣本省籍支持者為主體的民進黨，對李登輝身為台灣省籍人士當上總統，不免懷抱著「一喜一憂」的兩種矛盾情感。民進黨支持者或有民進黨認同傾向的民眾，喜的不外是：李登輝是台灣省籍的第一個總統，這是台灣四百年史上的頭一遭；從早期政治異議人士到「黨外」至民進黨以來一脈相承的反對國民黨政府（被稱為「外來政權」）的政治傳統，無不以「台灣人出頭天」向本省籍選民訴求，而李登輝以台灣本省籍的族群身分，不但位尊為國家元首，同時也擔任國民黨這個以往被視為是外省籍所掌控政黨的主席；當總統的李登輝不僅是台灣省籍人士的光榮，也顯示「台灣人出頭天」來臨的好徵兆，甚至有民進黨的核心人物（例如前黨主席黃信介）與部分支持者，因此在心中浮現出長久壓在「台灣結」潛意識中所謂「悲情台灣」的一種感情、想法與印象，並將這種潛意識投射在新加坡記者口中的、本省籍人士擔任的「台灣來的總統」，影響所及就是隱含著充滿族群

認同與台灣人因此可以驕傲等內涵的「李登輝情結」。總之，對民進黨的支持者或傾向於認同民進黨的本省籍選民而言，縱然了解到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的領導者，乃是民進黨邁向執政之路的絆腳石，但卻又無論如何也要體諒台灣人子弟的李登輝能在大陸省籍掌控的權力圈中出頭天（又是總統、又是黨主席）是那麼不容易的一件事，因此，而把所有的「台灣結」都投射到李登輝的個人身上。

民進黨所憂慮的不外是台灣省籍人士的李登輝總統，比較起大陸省籍的總統而言，會是在政黨競爭中更棘手的對手。民進黨原可以應用「台灣人支持台灣人」的策略，以省籍與族群身分的動員方式，來爭取占絕大多數人口比率的本省籍選民支持而執政。然而，台灣人子弟李登輝當上總統與國民黨黨主席的事實，一方面不但軟化了原先「台灣人出頭天」訴求的效果，另方面也模糊台灣省籍選民對原先認為國民黨是「外省人政黨」的印象。李登輝領導國民黨的種種作為，雖被「非主流派」及「新黨」視為是「台灣的國民黨」，但這對於爭取本省籍選民的支持而言，未嘗不是一件具有正面效果的。這樣的發展結果模糊了國民黨與民進黨間族群與省籍的分歧，迫使民進黨不能只依賴省籍與族群的訴求而必須另謀他途，來向廣大的本省籍選民證明民進黨是比李登輝領導的「台灣國民黨」值得支持。此外，李登輝的「元首外交」與「重返聯合國」的種種作為，也被台灣人認為是「台灣主體」的正確做法，這原為民進黨用以對付「中國國民黨」在高唱「一個中國」與「中國統一」的利器，卻被李登輝主導的「台灣國民黨」所發揮。雖然，民進黨近年來的選戰中，有效地應用「團結的民進黨」對「分裂的國民黨」來凸顯民進黨優於國民黨，但他們也了解到只要是台灣省籍的李登輝總統在位一天，執政來臨的時間或許就會延緩一日。

一九九三年「新黨」正式出現，這是以「新國民黨連線」的原國民黨黨員為主幹組成的政黨。在執政的國民黨中，所以會出現「新國民黨連線」的次級問政團體組織，主要的原因就是蔣經國去世後的國民黨權力重組所導致的，而最後掌握國民黨權力分配與重組的主角就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另組新黨的新國民黨連線的國民黨員，本來就是那些身處國民黨權力核心而具有影響或抱著謀取更大影響力的所謂忠貞從政黨員，但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再分配引起政爭時失利而出走。從一九八八年國民黨的代理主席之爭、一九九〇年三月間總統選舉的主流派與非主流的政爭、接著郝柏村取代李煥組閣、一九九三年郝柏村在第二屆立法委員選出後辭行政院長、至該年新黨的出現為止，國民黨的權力鬥爭與分裂都環繞在黨主席與國家元首等雙重角色的李登輝身上，而李登輝的種種作為與談話，都成為黨內不同派別在支持上或反對上的主要刺激訊息。國民黨主流派或所謂「台灣國民黨」的支持者，傾向於接受李登輝的作為是繼續維持執政地位所必要的角色扮演；然而非主流派的「中國國民黨」支持者，除了與新黨相互唱和外，也傾向於

認為李登輝的作為是國民黨分裂與政局動盪不安的肇因。因此，與國民黨的「主流派」具有「李登輝情結」比較來看，國民黨的「非主流派」與新黨則可說是具有「反李登輝情結」；同時，新黨與國民黨「非主流派」公開批判李登輝的種種作為，也喚起許多民眾內心「中國結」集體潛意識的浮現，不僅形成所謂「反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同時更具體化成為支持新黨的行動。

參、資料來源、省市長選舉與「李登輝情結」的測量

本文分析所根據的資料，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資助選舉與投票行為的兩個研究計畫：一是委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徐火炎主持的「政治體系變遷：民國八三年第一屆省長選舉投票行為研究」（計畫編號：NSC-2414-H-001-003-Q3），二是由台灣大學政治系朱雲漢主持的「民國八三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分析」（計畫編號：NSC-84-2414-H-002-027）。² 由於這兩個研究是採同樣的研究設計，因此，在分析上我們可以作比較；從比較分析中，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們所設計「李登輝情結」測量問題的信度問題，另方面也能夠從更多的資料基礎上了解所謂「李登輝情結」的心理現象。

在進入台灣省長選舉資料與台北市長選舉資料的比較之前，我們須先交代這兩個選舉與「李登輝情結」的關聯性。就台灣省長選舉方面，國民黨的候選人宋楚瑜雖然以當時官派省政府主席的優勢，很早就趁巡視地方建設之便遊走地方選舉而紮根，但由於傳統上台灣省長被視為以台灣省籍人士擔任為宜，尚且宋楚瑜一直處於中央黨務與官僚系統，沒有參與過地方或中央級的選舉經驗。因此，從一開始台灣省民就認為國民黨的省長候選人，比較可能會是資歷完整、具有選戰經驗而且是本省客籍的內政部長吳伯雄，但李登輝最後還是簽定宋楚瑜出馬競選台灣省長。所以，宋楚瑜在競選的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支持李登輝總統與李總統要他為台灣省民效勞等等的說明。民進黨的候選人陳定南，則在民進黨的兩階段初選中出線，雖然陳定南的知名度不如宋楚瑜來得高，但陳定南是台灣省人士，而且在兩屆的宜蘭縣長任內政績斐然，在立法院的時期與民進黨辦理涉及賄選黨員的處理上，也贏得一定的聲望。當時名聲響亮立場也引人爭議的立法委員朱高正，則以新黨之名競選。在競選議題上，宋楚瑜以國民黨的一貫立場，強調「維持現狀」而打「安定牌」；民進黨的陳定南則以「宜蘭經驗」與「變天」為主調，向廣大的台灣省籍選民招手；新黨的朱高正則以「批李」為重點，甚至也以「五通電話」來凸顯自我在海峽兩岸關係上的影響作用。選舉的結果說明台灣省長的選舉，主要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競爭的選舉：國民黨的宋楚瑜得票率為56.22%、民進黨的陳定南為

38.72%、新黨的朱高正則獲得4.31%的選票，而其他兩位無黨籍的候選人蔡政治與吳梓總得票數加起來僅達到0.75%。由於選民投票支持新黨的比率極低，在進行多變項統計分析時，投票支持新黨朱高正的選民樣本數，尚不足以構成有意義的統計分析單元；因此，以下分析台灣省長選舉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上，主要針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支持選民為主。

在台北市的選舉方面，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這三個政黨也都推出勢均力敵的候選人。國民黨的候選人是當時官派的台北市長黃大洲，雖然黃大洲的施政成效與當時的捷運問題叢生等，都讓一般人預期國民黨可能另物色適當人選出馬競選，但最後還是由黃大洲披掛上陣。一般選民都聽到過黃大洲與李登輝的關係淵遠，而李登輝總統也在觀察台北市政建設的各種場合，公開支持黃大洲繼續擔任台北市長。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則由民進黨辦初選的「長扁之爭」中獲得勝利的立法委員陳水扁掛帥。新黨則以當時辭去環保署長、在台北縣競選獲最高票當選的立法委員趙少康為市長候選人。這三黨候選人的知名度都很高，國民黨的黃大洲強調國民黨的「安定牌」，以任內的施政功績企圖遊說選民投票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以「快樂與新希望」的市民生活向選民保證，以避開民進黨「台灣獨立」可能引發的負面效果；新黨則以「反李、反台獨」為訴求，拿著國旗打「中華民國」保衛戰，以動員外省族群的支持。選舉的結果顯示：國民黨的黃大洲得票率為25.89%、民進黨的陳水扁為43.67%、趙少康則獲得30.17%的選票支持，而以無黨籍競選的紀榮治的得票率尚不及0.3%。基本上，台北市長的選舉可說是三黨角力的選舉，因此，在探討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時，我們必須同時分析三個政黨的支持者，這不同於分析兩黨為主體的台灣省長選舉資料。

交代本文分析資料的來源與說明兩個不同選區的選舉概況後，讓我們進入「李登輝情結」心理現象的測量。從上面介紹「情結」概念的內涵，及概略說明所謂「李登輝情結」現象出現的歷史經驗脈絡中，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李登輝情結」視為是「台灣結」與「中國結」兩種「集體潛意識」投射到李登輝身上的一種夾雜感情、想法與記憶的心理現象。在測量上，我們透過一般選民所熟悉的李登輝總統為對象，設計測量問題來了解選民回答時「腦海中立即浮現」的、關於李登輝的一組相互關聯的感情、想法、印象與記憶等心理取向。當然，在這樣的操作化界定後，我們稱為「李登輝情結」的內涵，以社會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稱之為關於李登輝的「人物思維結構體」（*person schemata*）或許會更為恰當。（Fiske and Taylor, 1984）但是，在一般的政治討論與對話中，既然「李登輝情結」一詞已經是廣為流傳的語彙，我們在此仍然沿用這種由心理分析術語轉成的口語，因為在有限的分析篇幅中，提供了解選民這種心理現象與投票行為間關係的分析，遠比名詞的爭議更為重要。

「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如表1所示，我們以同意或不同意等五個刻度的測量問題，來觀察選民的「李登輝情結」。第一道問題強調李登輝的「身分」不但是本省籍人士，而且更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從李登輝這種特殊的身分前提上，觀察選民是否因此無形中受到「台灣結」這種感情、想法與記憶的集體潛意識所左右，進而認為應該無條件地支持李登輝總統。第二道與第四道題目都以測量選民對李登輝總統的「認同」為主；第二道題所測量的乃是以「人」為中心的認同，因此，是用來了解選民對李總統「本人」所遭受的批評，究竟採取怎樣的歸因方式？選民是否會將李登輝總統個人的被批評，都歸咎於批評者出於其他的動機；第四題則測量以「事」為中心的認同，用來了解選民接不接受李登輝總統所作所為都是為台灣的前途，因此，將他作為上所遭受的批評（尤其是指民進黨或台灣人的批評），都視為是出於誤解或不了解李登輝所致。第三題是測量選民對李登輝領導的服膺與效忠，以了解選民會不會將台灣的前途等同於李登輝總統的領導，會不會認為當前只有李登輝才有辦法解決台灣的前途問題。第五道題是從反方向來測量選民對李登輝的總評價，將這種總評價投射到「蔣經國是否找對繼承人」的判準上；這道題也比較傾向於測量「反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從蔣經國指定李登輝為繼承人是否錯誤的評價中，來觀察選民是否質疑李登輝總統所作所為的正當性基礎。

從表1對測量李登輝情結心理題目的因素分析結果中，我們也發現：無論就台灣省的選民或台北市的選民來看，除了第五道問題以「反李登輝情結」為設計的題目外，其他測量「李登輝情結」的題目之間，都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因此，選民回答這些測量問題時「腦海中立即浮現」的相關聯心理現象，就是我們以下所謂的「李登輝情結」。從這樣的發演出發，我們可以從「台灣結」或「中國結」來看這兩種「集體潛意識」與「李登輝情結」的關聯性。我們認為在鉅變中的台灣社會，對個人而言所以會產生「李登輝情結」的心理現象，主要是受到背後這兩種「集體潛意識」所引導的結果。一般人所謂「台灣結」或「中國結」不外基於兩種基準為意義指涉的座標：一種是以客觀的本省與外省籍貫為主，另一種較晚進的看法是以自我認同為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為準。假定我們接受將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看成是一種「從先人過去生活演化總經驗所遺留下來的潛在記憶庫」內涵所指的「集體潛意識」，那麼無論是以「本省—外省」的省籍劃分或「台灣人—中國人」的族群認同區別來看，我們可以預期這種劃分與區別背後所隱含的集體潛意識，一旦浮現而投射到李登輝為對象所表現的心理現象，應該都會具有共同的結構形式或性質。

表1：李登輝情結的測量題目與因素分析結果

測量題目	李登輝情結的因素		
	台灣省 樣 本	台北市 樣 本	合 併 樣 本
(1)李登輝是我們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所以大家都應該支持他。	.7184	.7677	.7508
(2)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那 些別有用心的人。	.6301	.7037	.6718
(3)唯有讓李登輝總統繼續領導我們， 台灣才有前途。	.8106	.8195	.8200
(4)最近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做法， 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拼的苦心。	.7603	.7896	.7787
(5)有人認為蔣經國指定李登輝作他的 繼承人，是一大錯誤。	.4279	.4425	.4234
固有值	2.331	2.575	2.473
解釋變量百分比	46.6	51.5	49.5
有效樣本數	1481	1184	2665

我們把兩筆資料合併以後，以省籍劃分與族群認同兩種標準，將受試樣本加以區分為：本省籍與外省籍、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或兩者皆是等五個分別的群體；然後，藉著這種分別代表「台灣結」或「中國結」集體潛意識的不同選民群體上，當「台灣結」與「中國結」這兩種集體潛意識，被誘導而表現在以李登輝為對象的心理取向時，這種觀察到的「情結」心理現象（或稱為「腦海中立即浮現」的「思維結構體」）是否具有差別。從表2的因素分析結果中可以顯示出，無論我們採取省籍的劃分或族群認同的不同，對這些連接「台灣結」與「中國結」的次群體選民而言，「李登輝情結」的測量題之間都具有內部的一致性而形成一個因素的結構。這也說明我們所設計測量的「李登輝情結」量表，可以有效地觀察到選民的「台灣結」與「中國結」集體潛意識所浮現的一種對李登輝總統的心理取向。在本省籍或台灣人認同的選民群體中，第五道從歸咎蔣經國是否選對繼承人的「反李登輝情結」作為反面測量的題目，與正面測量對李登輝「本人身分、作為與必要領導」等正面測量題之間的相關性比較小；然而，對外省籍或中國

「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爲：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人認同的選民群體而言，這種相關性則比較高。這或許顯示具有「台灣結」的本省籍或台灣人認同的選民群體，對李登輝與台灣相關的身分、作為與領導等心理取向，與對「反李登輝」而歸咎於「蔣經國是否選對繼承人」的評價，比較傾向於分開處理而具有較小的相關性；但對於「中國結」比較強烈的外省籍或中國人認同的群體而言，則比較會將這兩類的看法與評價視為是一體兩面的事，因此具有較高的因素負荷量。

表2：李登輝情結與「台灣結」及「中國結」的關係

李登輝情結測量題	省籍劃分		族群認同		
	本省籍 樣 本	外省籍 樣 本	台灣人 認同者	兩者 都是	中國人 認同者
1)李登輝是我們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所以大家都應該支持他。	.7482	.7219	.7744	.7579	.7163
2)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那 些別有用心的人。	.6435	.7513	.6278	.6725	.7117
3)唯有讓李登輝總統繼續領導我們， 台灣才有前途。	.8196	.8223	.8204	.8222	.8263
4)最近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做法 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拼的苦心	.7732	.7804	.7753	.7778	.7867
5)有人認為蔣經國指定李登輝作他的 繼承人，是一大錯誤。	.3559	.5457	.3466	.3463	.5868
固有值	2.370	2.669	2.388	2.427	2.666
解釋變量百分比	47.4	53.4	47.8	48.5	53.3
有效樣本數	2181	438	786	1256	623

不同省籍與族群認同有別的選民群體，如上面表2的因素分析所顯示，在「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上，都呈現出單一面向性質的結構。假定省籍不同或族群認同有別的選民群體，可視為間接代表背後具有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等不同的集體潛意識，那麼選民這種單一面向的「李登輝情結」，也間接說明了「台灣結」與「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是具有相同的結構。這種「台灣結」與「中國結」集體潛意識的主要不同，若可以從省籍劃分與族群認同上表現出來，那麼省籍不同與族群認同有別的選民群體，在

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也會有「強弱」不同的差異。表3的分析結果就顯示出這種顯著的差異性。首先，為了避免在問卷訪問的過程中，因為受訪者在沒有聽清楚問題意思而順著回答「同意」，尤其是關於李登輝總統的測量問題上，選民或許更可能有隱藏負面態度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我們從回答測量題「反面」答項的百分比，來看省籍劃分與族群認同在李登輝情結上的差異。其次，從表3回答與問題相反方向的百分比中，可以發現省籍與族群認同的區別，反應在回答每一道測量問題上，差異都具有一致性。換句話說，本省籍與台灣人認同的群體，具有較強烈的「李登輝情結」，回答負面取向的比率（即：除了第五題是「同意」外，其他題都是「不同意」），都較外省籍與中國人認同的群體為顯著為低。

表3：「台灣結」及「中國結」在李登輝情結上的差異

李登輝情結測量題	省籍劃分		族群認同		
	本省籍 樣本	外省籍 樣本	台灣人 認同者	兩者 都是	中國人 認同者
1)李登輝是我們第一位台灣人總統， 所以大家都應該支持他。	37.7	59.4	38.2	38.4	49.1
2)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那 些別有用心的人。	44.7	62.6	44.8	45.5	53.8
3)唯有讓李登輝總統繼續領導我們， 台灣才有前途。	46.1	65.8	49.4	46.2	53.6
4)最近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做法 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拼的苦心	34.9	51.4	37.9	34.5	42.2
5)有人認為蔣經國指定李登輝作他的 繼承人，是一大錯誤。	6.9	20.5	6.7	8.1	14.3
有效樣本數	2181	438	786	1256	623

註：第五道題是反面的問法，其中的百分比則是以回答「同意或很同意」為準；省籍與族群認同的不同，分別在回答五道測量題的「反面」上，都具統計上 .001 水準的顯著差異。

從以上的分析中，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們設計來施測「李登輝情結」心理現象的量表題目，具有非常高的信度，無論對台灣省選民或台北市選民而言，所測得的「李登輝情結」，都具有相同的單一面向性質；另方面，假定本省籍與台灣人認同隱含著「台灣結」的集體潛意識，而外省籍與中國人認同指涉著「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那麼如上述分析結果所顯示的，不同省籍與族群認同有別的選民群體，在「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上仍具有相同的結構形式，這研究發現也間接地說明了「台灣結」與「中國結」乃是同屬一種「集體潛意識」的兩個以「台灣」與「中國」為記憶庫範疇的「原型」。「台灣結」與「中國結」投射在個人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上，雖然具有相同的結構形式，但仍具有正反與強弱程度上的顯著差異存在。

肆、影響「李登輝情結」的個人特徵、社會背景與政治屬性因素

在確定了我們所施測的「李登輝情結」心理現象的內涵後，接下來我們想要知道究竟是那些特徵、背景與政治屬性的選民，會有比較強烈的李登輝情結？當然，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已經指出省籍與族群認同，乃是一般理解「台灣結」與「中國結」意義上的參考座標，所以，選民在省籍與族群認同的區別，如上表3所呈現的結果一樣，必然也會在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上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此外，本文的分析也從選民的性別、年紀、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區域及是否居住過眷村等變項的不同，來看選民在「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上的差異。首先，從兩變項關係來看。

第一，就台灣省與台北市不同部分來看，如表4所顯示，台灣省的選民比台北市的選民，有較強烈的李登輝情結。這在於顯示出兩種可能的差異：一是台北市為台灣首府中央所在地，不僅選民的教育水準平均比較高，同時關於批評李登輝總統的種種訊息傳遞也較快較多，與台灣省幅員較廣大的選民比較來看，具有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就顯著地較弱；二是由於在台北市的選舉競爭中，新黨市長候選人趙少康，以「批李、反李」為競選的主要訴求並獲得第二高票，可見他的競選訴求也一定造成不少的影響，何況外省籍居住在台北市的人口比率，平均而言也較台灣省的外省籍居民比率要高出許多，因此相對台灣省選民而言，台北市選民顯著地較沒有「李登輝情結」（或說「反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較強）。此外，表4中也顯示台北市選民中的眷村居民與非眷村居民比較，顯著地較沒有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但對台灣省的選民而言，眷村的影響就變得不顯著。

表4：個人特徵、社會人口屬性與李登輝情結

李登輝情結 (合併樣本的因素分數)			
	z (N)	Eta值	
樣本別			
台北市	-.218 (1184)		
台灣省	.174 (1481)		
		.199***	
李登輝情結 (因素分數)			
		台灣省 z (N)	台北市 z (N)
性別		Eta值	Eta值
男	-.016 (770)		-.057 (586)
女	.017 (711)		.056 (598)
		.016	
省籍			
外省籍	-.437 (171)		-.420 (267)
本省籍	.048 (1270)		.122 (911)
		.156***	
年紀			
20-29	-.259 (366)		-.244 (249)
30-39	-.048 (426)		-.109 (315)
40-49	.158 (309)		.004 (311)
50-59	.228 (191)		.160 (123)
60-69	.103 (123)		.424 (100)
70-	.156 (66)		.368 (86)
		.176***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192 (493)		.355 (211)
初級中學	.135 (269)		.449 (138)
高級中學	-.030 (426)		.096 (290)
專科	-.269 (162)		-.183 (212)
大學及以上	-.584 (128)		-.380 (330)
		.231***	
職業類別			
農林漁業	.223 (104)		.606 (6)
一般勞工	.073 (353)		.179 (105)
家庭主婦	.190 (243)		.250 (228)
自營商	.076 (192)		.145 (162)
工商職員	-.290 (194)		-.128 (267)
政府人員	.126 (57)		-.195 (77)
經理人員	-.173 (92)		-.257 (171)
專門職業	-.258 (31)		-.329 (40)
		.174***	
眷村居民			
否	.012 (1344)		.044 (1023)
是	-.122 (137)		-.278 (161)
		.039	
		.110***	

*: p<.05 **: p<.01 ***: p<.001

第二，以台灣省與台北市具有相同的研究發現而言：首先，無論在大都會區的台北市或農村為主的台灣省，選民並沒有因為性別的不同而在「李登輝情結」上有顯著的差異；其次，選民的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等不同，無論就台灣省選民或台北市選民來說，都顯著地表現在「李登輝情結」的差別上：年紀較大的、教育程度較低的或職業類別比較屬於家庭主婦或勞動階層的選民，與年紀較輕的、教育程度較高的或職業類別較好的選民加以比較，則顯著地有較強烈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而且其間的差異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接下來，我們從多變項的角度來分析影響選民李登輝情結強弱不同的因素。談到影響選民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時，我們已經在無形中預設了一種可能的因果關係。我們用最小平方法的多元迴歸分析，來看影響選民李登輝情結等因素的相對決定效果。除了上述討論的省籍、族群認同、性別、年齡、教育、職業與眷村居住的經驗等變項之外，我們認為選民的政黨認同也是決定他對李登輝情結的因素。當然，這對國民黨與民進黨認同感情的選民而言，應該是合理的預設。這種分析上的因果關係假定，對新黨的中堅份子而言或許是有待商榷的，因為他們很可能是先有「反李登輝情結」才創新黨。然而，新黨應該不會只是「反李登輝情結」所組成的政黨，就新黨所標榜的政治立場來看，乃是「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浮現而採取行動組織的一個政治團體。進一步說，我們稱之為「李登輝情結」乃是測量問題所引導出來的「腦海中立即浮現」關於李登輝的心理取向，而接受新黨政治理念與認同於新黨的選民，也往往透過新黨的批判與活動才對李登輝形成「腦海中立即浮現」的心理取向。雖然，對認同新黨的選民而言，「政黨認同」與「李登輝情結」的因果順序，是可以進一步辯論的體裁，但就目前的分析而言，我們是從選民的政黨認同的差別（由感情上的接受、立場的接近與喜歡程度等所測量）來看「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的不同。

從表5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省籍、教育程度、國民黨認同感情與新黨認同感情等四個變項，無論就台灣省或台北市的選民來說，都是解釋李登輝情結程度為何不同的主要變項。本省籍的、教育程度較低的、國民黨認同感強的、與較不認同新黨的選民，具有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顯著地比較強烈；相對來看，外省籍的、教育程度較高的、較不認同國民黨的、與新黨認同感較強的選民，則比較沒有李登輝情結，或是說顯著地有較強烈「反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另外，就台北市的選民而言，在解釋李登輝情結的差異上，選民的年齡與政治認知程度仍具有顯著的淨影響效果；年齡較大的與政治認知程度較低的選民，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也顯著地較為強烈。

表5：影響李登輝情結等因素的一般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李登輝情結	
	台灣省	
	β	β
性別（男）	-.0451	-.0190
年齡	.0071	.0719 *
省籍（本）	.2017 ***	.1416 ***
教育程度	-.0989 **	-.1459 ***
眷村居住	.0025	-.0283
職業聲望	.0394	-.0413
族群認同	-.0240	-.0139
政治認知	-.0535	-.0600 *
國民黨認同	.3279 ***	.2597 ***
民進黨認同	-.0478	.0199
新黨認同	-.1485 ***	-.2138 ***
Adj R Square	.1859	.2479
有效樣本數	1045	960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註：性別與省籍變項以虛擬變項處理；職業則轉化為聲望分數。

從表4與表5關於解釋選民在李登輝情結上差異的變項分析中，首先可以一提的是，我們考慮的解釋變項並不多，而且有統計顯著影響作用的變項更少，但對於了解選民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的差異，卻具有相當的貢獻。以台灣省的選民樣本而言，解釋總變異量達百分之十八點六左右，而對台北市的選民，則可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解釋力。其次，從上面的討論與分析中，省籍的不同假定可以視為是代表「台灣結」與「中國結」集體潛意識不同的變項，這種差異當然可以預期是決定「李登輝情結」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在一併考慮其他變項的影響關係及政黨認同感情的影響作用時，原先我們認為會影響選民李登輝情結的「族群認同」變項，在台灣省與台北市兩組資料中，都沒有統計上顯著的淨影響作用存在。這項發現不外在於顯示，選民對自我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比較可能是由省籍差異所衍生出來而且與政黨認同具有密切關係的一種政治地理區域的自我認同感；當我們同時也考慮省籍與政黨認同的變項時，族群認同對李登

輝情結的影響作用就相對變為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第三，由於是三黨競爭的選舉環境，因此我們從選民分別對三個政黨的偏好、支持與接受等心理傾向來建構政黨認同感情；表5的分析結果顯示，選民以三個政黨為對象的政黨認同感，除了對民進黨的認同感沒有發生顯著的影響作用外，國民黨的認同感與新黨的認同感，對選民的李登輝情結都具有顯著的決定作用。民進黨認同變項與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間不存在顯著影響關係的發現，或許在於說明上述我們所提到的「一喜一憂」的矛盾心理，將兩者之間的顯著關係加以抵消。然而，從國民黨的認同感與新黨的認同感是呈現出相反方向的影響效果中，可以進一步說明國民黨與新黨的分歧，與「李登輝情結」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伍、決定省長選舉的因素與「李登輝情結」的影響

選民的省籍、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等差別，是決定李登輝情結強弱的主要解釋變項；以台北市的樣本來說，年齡與政治認知同時也是了解選民對李登輝所以具有不同心理取向的兩個解釋變項。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固然對選民的李登輝情結有進一步的理解，同時也看到選民的政黨認同，尤其是國民黨與新黨的認同與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具有密切的關係，那麼選民的「李登輝情結」是否與他們投給那個政黨的候選人具有密切的關係？在台灣省長的選舉過程中，國民黨的宋楚瑜無不時時向選民提及「李登輝總統的提拔與支持」；同樣地，在台北市長的選舉方面，李登輝總統也曾三番兩次地為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背書宣傳，至於新黨的趙少康更以「批李、反李」來號召選民；在這種或多或少環繞著李登輝總統的選舉情境下，選民的投票決定或許就不免受到「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所左右。

影響選民最後投票決定的因素有許多，除了可能的個人特徵與社會人口屬性的決定作用之外，根據一般所謂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的分析模型來看，最重要而且有直接影響作用的變項，還是選民的政黨認同、對候選人的評估與對選舉議題的評估等因素。當然，在台灣的選舉情境中，或許還有許多可能具有決定性但尚未被研究的變項存在（例如買票），但就本文的分析目的而言，我們加入族群認同與李登輝情結等兩個變項，來看台灣省與台北市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究竟受到那些主要的因素所決定。首先，我們把大部分可能的解釋變項都放進來考慮分析（台灣省與台北市的結果，列於附表1與附表2），發現李登輝情結這個變項在各種可能變項的影響效果都並存的情形下，並沒有顯著的淨影響作用存在。但是，為了簡單說明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我們將所有的個人特徵與社會人口屬性的變項暫時都不考慮進來的情形下，重新進行分析的結果如表6與表7所顯示：這種簡化解釋變項的分析模型，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解釋力並沒有因此

選舉研究

而具有顯著的差別，減少解釋變項只降低正確預測比率不到百分之一（與附表1與附表2比較）。在表6與表7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中，除了傳統上解釋選民投票決定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估、選舉議題評估等主要變項之外，我們增列族群認同與李登輝情結等兩個變項，透過這種比較來看選民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是否也對他的投票行為構成顯著的影響效果。我們這樣的處理不僅兼顧社會心理學途徑的選民投票抉擇模型，同時，也在於簡化解釋選民投票抉擇模型的考慮。既然考慮所有變

表6：台灣省長選舉決定選民投票因素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投民進黨（陳定南）票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族群認同	.3813 (.1577)*	1.4642
國民黨認同	-.5523 (.1100)***	5756
民進黨認同	.3784 (.0979)***	1.4600
新黨認同	-.0267 (.1242)	.9737
李登輝情結	-.2966 (.1560)@	.7433
民進黨執政評估	.1382 (.0386)***	1.1482
統獨議題立場	.2509 (.1278)*	1.2851
宋楚瑜評估	-.4271 (.0586)***	.6524
陳定南評估	.5730 (.0606)***	1.7735
朱高正評估	-.0460 (.0344)	.9550
常數項	-1.7376 (.2432)***	----
Log Likelihood = -200.707		
Number of obs = 1075		
chi2(10) = 799.30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R2 = 0.6657		
正確預測百分比 92.47		

* : p<.05 ** : p<.01 *** : p<.001 @ : p=.056

本表以投國民黨（宋楚瑜）票為基比類別，N=810，而投民進黨票的有效樣本數為265

「李登輝情結」與省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表7：台北市長選舉決定選民投票因素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投民進黨（陳水扁）票		投新黨（趙少康）票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族群認同	-.1239 (.1286)	.8835	-.2875 (.1614)	.7501
國民黨認同	-.3978 (.0781)***	.6718	-.3536 (.1015)***	.7021
民進黨認同	.1818 (.1006)‡	1.1993	-.8207 (.2211)***	.4401
新黨認同	-.3710 (.1156)***	.6900	.2767 (.1014)**	1.3187
李登輝情結	.0469 (.1478)	1.0481	-.3214 (.1898)‡	.7252
民進黨執政評估	.1803 (.0366)***	1.1976	.1528 (.0468)***	1.1651
統獨議題立場	.4375 (.1292)***	1.5488	.3249 (.1691)@	1.3838
黃大洲評估	-.3741 (.0458)***	.6879	-.4365 (.0530)***	.6463
陳水扁評估	.3535 (.0462)***	1.4241	.0224 (.0570)	1.0227
趙少康評估	-.0058 (.0345)	.9942	.4180 (.0585)***	1.5190
常數項	-.2756 (.2701)	-----	-1.0711 (.3488)**	-----
Log Likelihood	= -361.580			
Number of obs	= 967			
chi2(20)	= 1300.21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R2	= 0.6426			
正確預測百分比	84.90			

* : p<.05 ** : p<.01 *** : p<.001 @ : p=.055 ‡ : p<.08

本表以投國民黨（黃大洲）票者為基底類別，N=252，而投民進黨陳水扁的與新黨趙少康的有效樣本數，分別為474與241。

項時，選民對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顯著關係被沖淡或取代，那麼以一個更精簡又沒有犧牲解釋力的分析模型中，或許就可以觀察到「李登輝情結」變項對投票抉擇行為的顯著影響作用。

首先，從選民自我認為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族群認同而言，只在台灣省長選舉中發生作用，這與陳定南在選舉過程中，以「台灣人投台灣人」的競選，或許也具有關係，但這種淨影響效果在台北市長選舉競爭中就不存在。其次，以選舉議題而言，在省長與

市長的選舉中，老年人年金的發放金額、政府施政成效、金錢與黑道的猖狂、及其他公共政策（尤以台北市選舉的交通與捷運系統問題）等，固然是競選的訴求與點燃選戰的重點之一，但是統獨的議題立場與民進黨執政後果的批評與辯護等，才是主導台灣省長與台北市長選舉政黨競爭的基線，也是最顯著的議題。從表6與表7的分析結果中，我們也發現這兩類的選舉議題評估，的確顯著地影響選民的黨派投票決定。第三，無論在台灣省長選舉或台北市長選舉上，如表6與表7所顯示的分析結果，與社會心理學途徑投票抉擇模型傳統上所發現與預測的一樣，政黨認同毫無疑問地都是解釋選民投票給某黨候選人的顯著性變項。我們對政黨認同的操作化測量，以選民分別對三個政黨具有三種分別的政黨認同感情，將選民的三種政黨認同感情並列比較之中，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選民的政黨認同感情與投票行為的決定關係。第四，候選人的評估與投票支持候選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可說已經是自明之理；表6與表7的分析結果中再度也印證這層影響關係：選民對某位候選人持著比較強烈正面的評估，也必然顯著地會傾向投票給這位候選人。

在台灣省長與台北市長的選舉競爭過程中，多少都會環繞著李登輝總統以作為選舉競爭訴求選民支持或反對的內容素材，但從表6與表7的分析結果顯示，選民的李登輝情結與黨派投票抉擇之間，在同時將傳統上主要的解釋變項都考慮進來分析的情況下，影響效果並未達.05以上的顯著水準。但若以較寬鬆的標準（ $p<.06$ ）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選民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會影響他的黨派投票決定。以台灣省長選舉而言，選民的「李登輝情結」越強烈，則越傾向於不會投票支持民進黨的陳定南，亦即較可能投票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宋楚瑜；在台北市長的選舉方面，選民愈有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則愈可能支持李登輝背書支持的現任市長黃大洲，也愈可能不會投票支持新黨的趙少康，但卻與投票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

在一個頗受「李登輝情結」籠罩的大選舉環境下，由上面的分析結果中，卻又可以發現「李登輝情結」與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之間，只是一種「不太顯著的」影響關係，那麼究竟「李登輝情結」對一般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真正作用在那裡？為了進一步說明「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對選民投票行為可能的間接作用，我們將上面討論過的、對選民黨派投票抉擇具有顯著影響作用的「投票考慮」因素作為依變項，然後觀察「李登輝情結」對這些「投票考慮」因素的影響作用。當然，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取向並不是唯一決定選民「投票考慮」的主要變項，所以，我們也必須同時考慮選民的個人特徵、社會人口屬性與政黨認同等變項的影響，這樣才能比較客觀地了解「李登輝情結」的影響效果。

從表8分析結果中，李登輝情結對宋楚瑜的評價、朱高正的評價與民進黨執政後果的評估等「投票考慮」因素，都具有顯著的獨立影響作用。換句話說，在台灣省長的選

「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表8：影響台灣省選民投票考慮等因素的一般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宋楚瑜 的評估 β	陳定南 的評估 β	朱高正 的評估 β	統獨議題 的立場 β	民進黨執政 的評估 β
性別（男）	.0730**	.0346	.0436	-.0573@	.0214
年齡	-.1326***	-.0693*	.0266	.1122***	.0480
省籍（本）	-.0045	.0465	.0200	.0395	.1169***
教育程度	.0413	.0625	.0694@	.0533	-.0169
眷村居住	.0381	-.0113	-.0020	-.0351	.0167
職業聲望	.0201	.0014	-.0347	.0037	-.0360
族群認同	-.0364	.1143***	-.0104	.2235***	.0695**
政治認知	.1264***	.1126***	.0065	.0683*	.0261
國民黨認同	.3852***	-.1235***	.0192	-.1283***	-.2741***
民進黨認同	-.2022***	.3705***	-.1089**	.1476***	.3243***
新黨認同	.1001***	-.0486	.2273***	-.1075***	-.1478***
李登輝情結	.2134***	-.0094	-.0748*	-.0546	-.1916***
Adj R Square	.3965	.3184	.0835	.1875	.4482
有效樣本數	1405	1405	1405	1405	1405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 p = .06

舉投票中，選民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直接地影響到他們對宋楚瑜的評價與民進黨執政後果的評價，然後間接地影響到投票支持宋楚瑜的行為決定。這種間接的影響作用，同樣可以在台北市長選舉中得到印證：選民的「李登輝情結」變項對黃大洲的評價、陳水扁的評價、趙少康的評價與民進黨執政後果的評估等，都具有顯著的獨立影響效果。換句話說，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黃大洲、陳水扁與趙少康等候選人或政黨（主要是民進黨執政的問題）在選民的印象中，會因選民具有李登輝情結的強弱而受到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種對候選人與政黨的正負面評估，則直接地影響了選民投票給某位候選人的最後決定。另外，還有兩個值得進一步指出的兩個研究：第一，新黨的台灣省長候選人朱高正與台北市候選人趙少康，都在競選過程中以「批李、反李」為訴求，因此，愈具有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的選民，對他們的評價也顯著地愈趨向於負面。第二，對在台北市的選民而言，李登輝情結心理取向愈強烈的選民，對李登輝背書的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的評價固然也會顯著地愈高，這本來就是可以預期的研究結果；然而，李登輝情結

與陳水扁的評價之間具有正面而顯著影響關係的研究發現，一方面或許是說明民進黨的陳水扁在競選中「只攻擊黃大洲不理李登輝」有關，因此，選民的李登輝情結與陳水扁的評價之間，還是具有顯著而正面的影響效果；另方面也顯示出，具有強烈李登輝情結的選民，原來可能投票支持黃大洲但也可以接受陳水扁，而兩人重疊部份的潛在支持者主要也是本省籍選民為主。

表9：影響台北市選民投票考慮等因素的一般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黃大洲 的評估	陳水扁 的評估	趙少康 的評估	統獨議題 的立場	民進黨執政 的評估
	β	β	β	β	β
性別（男）	.0062	.0333	.0787**	-.0357	.0032
年齡	.0569	-.1276***	.0072	.0212	-.0306
省籍（本）	.0645	.0509	-.0603*	.0808*	.0455
教育程度	.0429	.1085**	.0684*	-.0211	-.0144
眷村居住	.0025	-.0096	-.0343	.0408	-.0207
職業聲望	-.0060	.0536	.0227	.0553	.0274
族群認同	-.0440	.0783*	-.0664*	.2331***	.1759***
政治認知	-.0095	.1388***	-.0193	.0555@	.0879***
<hr/>					
國民黨認同	.3104***	-.1524***	.0042	-.0886**	-.2012***
民進黨認同	-.1265***	.3442***	-.1532***	.2462***	.3169***
新黨認同	-.0771*	.0180	.4831***	-.1389***	-.1740***
<hr/>					
李登輝情結	.2529***	.1234***	-.0593*	.0046	-.0842**
Adj R Square	.2743	.3111	.4503	.3086	.4238
有效樣本數	960	960	960	960	960

*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 $p < .06$

從以上的分析中，「李登輝情結」的心理因素，對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的直接影響作用，雖然「不太顯著」（當然也許是抽樣誤差所致），但透過影響選民的「投票考慮」等因素而對最後的黨派投票決定具有顯著的間接影響效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國民黨的宋楚瑜曾掌握國民黨黨機器多年後，在台灣省長的競選過程中，對只依賴國民黨的動員力量爭取勝選猶不具十分的把握，必須三番兩次地提到李登輝總統的提拔等等，透過選民的「李登輝情結」的心理作用，爭取廣大本省籍選民的認同。在本省籍的吳伯雄

退出後，如何應用選民的「李登輝情結」的心理來為勝選鋪路，更顯得是當選的重要基礎之一。同時，這也可以說明台北市長候選人的趙少康以「批李、反李」而能激起選情的熾熱化，並透過「反李登輝情結」而達到刺激「外省人危機意識」的動員效果，結果也凝聚了第二高票的得票支持率。李登輝情結與陳水扁的評估之間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效果，說明陳水扁的選民與黃大洲的選民，在「李登輝情結」方面都具有高度重疊的本省籍選民；但是，在黃大洲的市政廣受批評與陳水扁的「快樂與新希望」之間的對比情況下，選擇支持陳水扁的「求變」選民，比率上卻佔絕大多數，結果是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此外，李登輝情結與民進黨執政後果的評估之間，具有顯著而負面的影響作用，這也同時指出民進黨的困境所在：只要選民愈喜歡李登輝總統，對民進黨執政的後果愈傾向於負面的評估。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的主導者，勢必批評民進黨以確保國民黨的繼續執政，因此「李登輝情結」較強烈的選民，也傾向與李登輝批評民進黨看法趨於一致。

陸、結論

「李登輝情結」是流行的口語，但本文嘗試用心理學術語的概念來說明這種心理現象。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李登輝情結的心理現象，是透過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這兩種預設的集體潛意識來了解。當然，一種具有政治意含的心理現象，無論是存在於集體層次或是個體層次，必然無法獨立於所發生的環境脈絡而存在。因此，我們從解嚴前後的時空環境變化中，來看「李登輝情結」這種政治心理現象的出現與內涵。雖然，在社會調查資料收集上，「李登輝情結」或許只限於選民對李登輝總統的一種態度意見等心理取向，但我們認為「李登輝情結」所顯示的內涵，雖然不必然是心理分析所謂「情結」概念所指的因創傷事件而形成的潛意識心理現象，但也不只是社會調查所得的態度與意見等心理取向而已。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台灣結」與「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中去了解「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意義。

從決定「李登輝情結」的影響因素探討中，我們發現省籍、教育程度與政黨認同感是決定李登輝情結的主要變項。其中，新黨的認同感情與李登輝情結具有反方向的顯著影響關係；這與國民黨認同感的正方向顯著作用比較來看，剛好成為強烈的對比。從選民在省市長選舉的黨派投票決定的角度來觀察，選民對李登輝的心理取向與省市長的黨派投票抉擇之間，只是具有「不太顯著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關係雖然沒有想像中來得那麼具有決定性的效果，但卻也不能忽略這種「李登輝情結」與「反李登輝情結」的間接作用，尤其在台北市的選舉競爭中更為明顯。

「李登輝情結」的現象，固然可以視為是「台灣結」集體潛意識所浮現而投射到李登輝身上的一種政治心理，然而卻在台灣面臨民主轉型、海峽兩岸關係變化與國家主權定位的變局中凸顯出帶動政治轉變的重要性。當然，這種重要性一方面表現在李登輝敢於放手去推行台灣為主體的種種國家政策（重返聯合國與元首外交等），另一方面也因為李登輝的作為而更形成了民眾的「李登輝情結」，使得李登輝總統可以很有自信地說：「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來合理化因政爭而引起的種種批評。「李登輝情結」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並沒有結構上分歧的效果，然而卻是國民黨與新黨之間由「解組到重組」的主要戰場。由於「李登輝情結」不僅僅是選民對李登輝個人的一組心理取向而已，更是背後所牽引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的集體潛意識，因此，只要涉及「李登輝情結」或「反李登輝情結」的任何政治競爭，都不免會激化族群的政治衝突或將族群議題再度搬上臺面。究竟「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是族群政治的催化劑或是政黨重組的導線，或許只是見仁見智的解釋角度問題；但無可否認的是選民的「李登輝情結」確實影響他們對候選人與政黨所作的正負面評估，間接地左右他們在選舉時的投票抉擇。

註 釋

註一：關於schema或schemata的中譯，在心理學上有譯為「基模」與「基體」，但皆不能望文生義，因此，在沒有更好的中文譯名出現以前，暫譯為「思維結構體」。在其他文章中作者也使用同樣的譯名，並對「思維結構體」的概念有進一步的說明。（徐火炎，1995）

註二：參與協同主持這兩個集體研究計畫的研究同仁尚有：胡佛、陳德禹、吳乃德、游盈隆、陳明通、梁雙蓮與洪永泰等教授，而且參與這兩個集體研究計畫的所有同仁，對整個研究都具有同等的貢獻。另外，這兩個選舉行爲調查的樣本，都是採取分層比率的抽樣方式，即分為鄉鎮市區與村里兩層，以選民數的大小比率隨機抽出。

參考書目

徐火炎

- 1995 〈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爲〉，《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七卷第一期：頁247-288。

Fiske, Susan T., and Shelly E. Taylor.

- 1984 *Social Cogni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Jung, Carl G.

- 1960a "A Review of the Complex Theor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8. edited and translated, R. F. C. Hul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960b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Psych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8. edited and translated, R. F. C. Hul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969a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 Pt.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R. F. C. Hul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969b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unsciou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Vol. 9, Pt. 1. edited and translated, R. F. C. Hul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Taylor, Shelly E. and Susan T. Fiske.

- 1978 "Salience, Attention and Attribution: Top of the Head Pheonomena." In *Advances in Social Psychology*. ed. L. Berkowiz. New York: Academia Press.

Zaller, John R.

- 1992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附 錄

附表1：台灣省長選舉決定選民投票因素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投民進黨（陳定南）票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性別（男）	.2972 (.2821)	1.3461
年齡	-.0357 (.0131)**	.9649
省籍（本）	-.8340 (.7658)	.4343
教育程度	-.0757 (.1386)	.9271
眷村居住	-1.4456 (.8100)	.2356
職業聲望	.0328 (.0160)*	1.0333
族群認同	.4176 (.1634)*	1.5182
政治認知	.1603 (.0611)**	1.1738
李登輝情結	-.1616 (.1666)	.8508
國民黨認同	-.5658 (.1148)***	.5679
民進黨認同	.3655 (.1032)***	1.4412
新黨認同	-.0986 (.1370)	.9061
民進黨執政評估	.1546 (.0405)***	1.1672
統獨議題立場	.2131 (.1302)	1.2375
宋楚瑜評估	-.4966 (.0649)***	.6086
陳定南評估	.5471 (.0630)***	1.7283
朱高正評估	-.0340 (.0362)	.9666
常數項	-1.5633 (1.198)	
Log Likelihood	= -184.35014	
Number of obs	= 1045	
chi2(17)	= 810.41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R2	= 0.6873	
正確預測百分比	92.25	

* : p<.05 ** : p<.01 *** : p<.001

本表以投國民黨（宋楚瑜）票為基比類別，N=782，而投民進黨票的樣本數為263。

附表2：台北市長選舉決定選民投票因素的多元邏輯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投民進黨（陳水扁）票		投新黨（趙少康）票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估計值（標準差）	機率比
性別（男）	-.0795 (.2738)	.9236	-.5537 (.3626)	.5748
年齡	-.0084 (.0097)	.9917	.0039 (.0127)	1.0039
省籍（本）	.6448 (.4640)	1.9056	-1.2275 (.4556)**	.2930
教育程度	-.1137 (.1135)	.8925	.3786 (.1499)*	1.4602
眷村居住	-.0953 (.4903)	.9091	-.3970 (.4941)	.6723
職業聲望	-.0272 (.0144)@	.9732	-.0254 (.0194)	.9749
族群認同	-.1551 (.1343)	.8563	-.1288 (.1741)	.8791
政治認知	-.0398 (.0547)	.9610	-.0707 (.0725)	.9318
李登輝情結	-.0442 (.1583)	.9568	-.2949 (.1995)	.7446
國民黨認同	-.3570 (.0811)***	.6998	-.3692 (.1052)***	.6913
民進黨認同	.1569 (.1015)	1.1698	-.7529 (.2242)***	.4710
新黨認同	-.3947 (.1204)***	.6739	.2636 (.1030)*	1.3016
民進黨執政評估	.1943 (.0383)***	1.2145	.1400 (.0484)**	1.1503
統獨議題立場	.4291 (.1330)***	1.5359	.3674 (.1782)*	1.4439
黃大洲評估	-.3855 (.0468)***	.6801	-.4284 (.0545)***	.6515
陳水扁評估	.4057 (.0529)***	1.5003	.0229 (.0609)	1.0231
趙少康評估	-.0074 (.0357)	.9926	.4124 (.0623)***	1.5104
常數項	1.1756 (.9418)	---	.4392 (1.257)	----
Log Likelihood	= -340.48067			
Number of obs	= 960			
chi2(34)	= 1328.54			
Prob > chi2	= 0.0000			
Pseudo R2	= 0.6611			
正確預測百分比	= 85.21			

*: p<.05 **: p<.01 ***: p<.001

本表以投國民黨（黃大洲）票者為基底類別，N=250，而投民進黨陳水扁的與新黨趙少康的樣本數，分別為470與240。

測量題目：

李登輝情結的測量：

- 1) 李登輝是我們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所以大家都應該支持他。 (+)
- 2) 常批評李登輝總統的人，都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 (+)
- 3) 唯有讓李登輝總統繼續領導我們，台灣才有前途。 (+)
- 4) 最近有許多人批評李登輝總統的做法，都是因為不了解他為台灣打拼的苦心。 (+)
- 5) 有人認為蔣經國指定李登輝作他的繼承人，是一大錯誤。 (-)

政黨認同的測量：

目前國內有三個常聽到的政黨，分別是國民黨、民進黨、新黨。

一、政黨偏好：

1. 對於這三個政黨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請問您對這三個政黨喜歡或不喜歡的情況如何？
 - (1) 國民黨 (很喜歡、喜歡、無所謂喜不喜歡、不喜歡、很不喜歡)
 - (2) 民進黨 (很喜歡、喜歡、無所謂喜不喜歡、不喜歡、很不喜歡)
 - (3) 新黨 (很喜歡、喜歡、無所謂喜不喜歡、不喜歡、很不喜歡)

二、政黨立場的接近傾向

2. 這三個政黨各有不同的立場和主張。請問您覺得那一個政黨的立場和主張，跟您的看法比較接近？
 - (1) 國民黨 (續問：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
 - (2) 民進黨 (續問：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
 - (3) 新黨 (續問：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
 - (4) 不接近任何一個政黨
 - (5) 其他 (請註明)

三、政黨感情的接受傾向

3. 就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這三個主要政黨而言，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那個政黨？
 - (1) 國民黨 (續問：請問您傾向國民黨的程度如何？)

(2)民進黨（續問：請問您傾向民進黨的程度如何？）

(3)新黨（續問：請問您傾向新黨的程度如何？）

(4)不傾向任何一個政黨

(5)傾向其他政黨（請註明）

候選人的評估：

22.以下是一般人常提到作為省長的重要條件：能力、操守、了解民眾的需要、值得人民信賴等等，這次省長選舉有三個主要的候選人，請問您的看法怎樣？

*（台灣省以朱高正、宋楚瑜與陳定南為問項，台北市則以趙少康、黃大洲與陳水扁為問項；以下是以台灣省的問卷題目為本）

(1)在能力方面：

A.朱高正的能力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B.宋楚瑜的能力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C.陳定南的能力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2)在操守方面：

A.陳定南的操守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B.朱高正的操守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C.宋楚瑜的操守怎樣？（很強、尚可、稍差、很差）

(3)在了解民眾的需要方面：

A.宋楚瑜是否了解民眾的需要？（很了解、還算了解、不太了解、很不了解）

B.陳定南是否了解民眾的需要？（很了解、還算了解、不太了解、很不了解）

C.朱高正是否了解民眾的需要？（很了解、還算了解、不太了解、很不了解）

(4)在值得人民信賴方面：

A.朱高正是否可以信賴？（很可以、尚可以、不太可以、完全不可以）

B.宋楚瑜是否可以信賴？（很可以、尚可以、不太可以、完全不可以）

C.陳定南是否可以信賴？（很可以、尚可以、不太可以、完全不可以）

(5)在認同方面：

A.陳定南是否認同台灣？（是、否、很難講）

B.朱高正是否認同台灣？（是、否、很難講）

C.宋楚瑜是否認同台灣？（是、否、很難講）

(6)請問您欣不欣賞宋楚瑜、陳定南、朱高正這三位省長候選人？

A.朱高正（很欣賞、欣賞、無所謂欣不欣賞、不欣賞、很不欣賞）

「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投票行為：一項政治心理學的分析

- B. 宋楚瑜（很欣賞、欣賞、無所謂欣不欣賞、不欣賞、很不欣賞）
- C. 陳定南（很欣賞、欣賞、無所謂欣不欣賞、不欣賞、很不欣賞）

對民進黨執政的後果評估：

14. 下面是選舉期間常被提到的一些說法，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 (1) 有人說：民進黨如果執政，會造成台灣社會內部不安定。(-)
- (2) 有人說：民進黨執政，遲早會引發中共武力犯台。(-)
- (3) 有人說：唯有讓國民黨繼續執政，才能保持台灣的安定繁榮。(-)

族群認同的測量：

13-3. 在您的感覺上，您比較屬於那個族群？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 (1) 中國人(續問：請問您自認是中國人的感覺有多強烈？強烈或普通)
- (2) 台灣人(續問：請問您自認是台灣人的感覺有多強烈？強烈或普通)
- (3) 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統獨議題的立場：

國內對於台灣將來應該是獨立或與大陸統一有很多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有些人認為將來台灣「獨立建國」比較好；也有些人認為未來台灣與大陸「統一」比較好。請問您的意見怎樣？

- (1) 「獨立建國」（續問：請問您是否堅持台灣「獨立建國」？）
- (2) 「統一」（續問：請問您是否堅持「統一」？）
- (3) 維持現狀（不統不獨）（續問：如果現狀無法維持，您的選擇是獨立？還是統一？）
- (4) 無所謂
- (5) 其他

論文審查結果及意見：

1. 本文二、「情結」的概念與「李登輝情結」的現象論述太過冗長，使論文一開始就不免令人有「頭重」之病。是否能夠刪減為較簡單清晰的說明。進而對於「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為的相關分析，亦宜作簡要的論述提示，幫助閱讀者。
2. 題目下，建議增加「論文摘要」，亦有助論文的陳述。

論文評審意見的答覆：

首先，謝謝兩位匿名評審人的寶貴修正意見，本文都慎重加以參酌修正。至於評審意見中認為：一、本文關於「情結」的概念與「李登輝情結」的現象論述太過冗長，使論文一開始就不免令人有「頭重」之病，而建議刪減為較簡單清晰的說明意見；二、「李登輝情結」與省市長選舉選民投票行為的相關分析，宜作簡要的論述提示，以幫助閱讀者等。作者接受寶貴的評審意見，但並沒有完全修正，特分別說明於下：第一，本文嘗試以政治學者較不熟悉的心理分析之「情結」概念，來說明流行於當前政治討論對話中「李登輝情結」的政治心理現象，以作為學術上較為嚴謹的分析；因此，本文必須詳盡的交代「情結」的概念，同時，「李登輝情結」作為有意義的大眾政治心理現象，必須從它出現的歷史脈絡與生成的環境背景的說明中，才能獲得比較完整的理解；然後，才能以比較具體地探討這種政治心理現象的實質內涵與可能影響。第二，本文關於「李登輝情結」與選民投票行為的相關分析，皆依循由簡而繁的原則，從兩變項關係的說明至多變項關係的探討，甚至也按資料測量的性質，進一步作因果預設的一般迴歸或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等等，雖然作者承認這樣的剖析方式，或有冗長的可能，但也同時認為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完整而有層次的詳盡分析，或許更有助益於嘗試進一步了解的讀者。當然，這乃是見仁見智的觀點問題。若作者可改進之處未盡善，應咎於作者的堅持不當，而失之於作者的不敏與不能從善如流也。

'Lee Teng-hui Complex' and Voting Behaviors: A Psycho-political Analysis of Vote-choices in the 1994 Taiwan's Gubernatorial and Taipei Mayoral Elections

Huo-yan Shyu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first to re-conceptualize public's deep-seated ambivalent feelings, thoughts and perceptions about the first Taiwanese President Lee as 'Lee Teng-hui complex' by referring the concept 'complex' back to analytical psychologist Carl Jung's original usage. Second, in our empirical analysis Lee Teng-hui complex is then operationalized and measured as individual's positive-negative affect responses that taken to be off the top of the head while confront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President Lee. As shown in our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electoral survey data, individual's ethnicity, education, and partisanship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Lee Teng-hui complex. Moreover, same as that of Taiwanese vs. mainlanders, KMT and NP identifiers are also found polarized in the measure of Lee Teng-hui complex. Among direct determinants of individual's partisan vote-choices, Lee Teng-hui complex is found only margin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it is a major intervening variable in shaping individual's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issues and parties that lead to the final vote-choice making in both the 1994 Taiwan's Gubernatorial and Taipei Mayoral elections.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individual's ambivalent affect toward President Lee, commonly termed 'Lee Teng-hui complex' in public discourse, has indeed served as the catalyst for the forming of the splinter New Party on the one hand, and it has only hollo-effect functioning as indirect factor in

shaping individual's partisan vote-choices on the other.

Keywords: complex, Lee Teng-hui complex, Taiwan complex, China complex, schema, KMT identification, DPP identification, NP identification